

石峁是座什么城?

□ 孙周勇 邵 晶

黄帝之时

自古以来,无论是中国史学界,还是在考古学界,在有关中华文明起源的问题上,大家逐渐取得的一个共识:中华文明是多源的,是由各地区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古代氏族部落或部落集团的人们共同创造的。传说中的“五帝”,包括其他一些传说中人物,不过就是进入文明前不同地区氏族部落集团的首领,或其奉祀的祖先。尽管这各个部落集团兴起的时间有一些先后的差别,毫无疑问,黄帝应当是西北地区,包括今陕、晋北部、内蒙古中南部广大地区的部族集团的首领,或其奉祀的祖先。正是抱着这样一种认识,我在有关刊物上看到陕北神木石峁发现史前史前大遗址及其他文明遗迹的消息时,便立即想到它应当就是古代黄帝部族的居邑,并从而在《光明日报》国学版上写下了自己有关认识的文章。如今,两年多过去了。今天,国学版特地再次发表石峁古城的发掘者、先后两任石峁考古发掘队的队长孙周勇和邵晶先生论石峁遗址的文章,这对于深入探讨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与形成,无疑会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

以玉为兵

孙、邵两位先生的文章指出,石峁遗址是公元前2300年中国北方区域政体的中心,这个说法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它是建立在石峁遗址是其时陕北乃至整个中国北方唯一一处特大型聚落,且作为本地区数千个同时期各种规模聚落的中心,握有对这些聚落居住的大小族群进行支配的权力这一事实基础之上的。作者推测这座古城建成的年代在公元前2300年,这也是建立在碳十四测年及对大量出土器物的测验基础之上的。虽然我们不禁想把黄帝理解成是顛项以下各位古帝王的嫡系祖先,但认为黄帝及其他部族活动在距今4500年或4300年前后这个说法,还是比较接近史实的。我们完全可以据此认为,石峁古城就是活跃在这一地区的黄帝部族的居邑。

作出这一结论,其理由并不限于我们上一篇文章所列举的那些文献及考古方面的实证材料,石峁出土的大量玉器亦是石峁古城属于黄帝部族居邑的最好证明。石峁与其附近地区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陆续有玉器出土,然多流失国外。据说这些流失国外的石峁玉器的数量达到4000余件之多。新中国成立后的70年代,曾有陕西省考古工作者到石峁农家进行文物征集工作,一次便征集到127件玉器(现藏陕西省博物馆)。之后,又有地方文物考古部门及民间收藏人士继续在石峁地区从事玉器收集和收购,所收亦有五、六百件,现分藏于榆林市和神木县的博物馆,以及收藏者个人手中。从所征集到的石峁玉器看,其器类有牙璋、刀、钺、戈、斧、铲、璧、牙璧、鹰首斧、虎头、人首、蚕形器等,但以牙璋、刀、钺等兵器的数量居多,也最具有特色。由于上述玉器的出土皆未经过正式的考古发掘,致使长期以来人们对石峁玉器的年代众说纷纭,有说其为龙山时代的,有说其为夏代的,有说其为商代的,甚至有说其为西周乃至汉代。最近,经过科学的考古发掘,发现这些玉器多藏于石峁古城的城墙里面,从而证明石峁玉器的年代实不晚于石峁古城建成之年,即公元前2300年。从实情分析,也许有的玉器的年代会更早一些。

面对数量如此巨大的石峁史前玉器,特别是各种款式的玉制兵器,人们不禁想到古文献提到的“黄帝之时,以玉为兵”的传说(《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宝剑》)。尽管这所谓玉兵在今天看来并不是用于战争的真正兵器,而只可能是某种驱邪的巫术所使用的仪式用品,但却不妨碍它作为一种新的器类的出现所具有的区别时代的标志意义。若承认这一点,那么玉兵的出现与黄帝部族在历史舞台上兴起的时间也应当认为是一致的,而玉兵及其他玉器在石峁及周围地区的大量涌现,也正可以说成是黄帝部族活动在陕北地区的证据。

作为这个说法的旁证,我们还可以在《山海经》等反映我国传说时代历史及地理的古书中找到黄帝与其所在的北方地区出产古玉相互关联的证据。例如人们十分关注的《山海经·西次三经》中,就记有黄帝所在的崆峒山(即密山,在今内蒙古阴山)“其中多白玉,是有玉膏,其原沸涌汤汤,黄帝是食是飧,是生玄玉……黄帝乃取崆峒山之玉荣,而投之钟山之阳。璿珠之玉为良,坚栗精密,浊泽而有光”。作为黄帝下都的昆仑山,亦是“其中多玉”;帝之平圃(即玄圃)所在的槐江之山上,则是“多青雄黄,多藏琅玕、黄金、玉”。考虑到《山海经》全书除黄帝以外,更无其他古帝有与玉或类似玉的矿物发生关联的记载,则黄帝与其所统率的部族生活在今内蒙古、陕北,并为石峁与其附近出土玉器的主人,应是毋庸置疑的。

最后,作为黄帝直系后裔的周人对玉的崇拜,亦是石峁遗址,以及石峁玉器属于黄帝族的有力证明。周人起源于白狄,亦即黄帝氏族,并由陕北一带迁往渭水流域,我过去曾撰文予以阐释(见沈长云《周族起源诸说辨正——兼论周族起源于白狄》,《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3期)。此结论多依文献与考古资料为说,今得石峁发现的玉器而益信。盖周人不仅是玉文化、玉礼的发扬光大者,其本身更是玉器、各种玉制品的生产者和加工制造者。对于早期周人以治玉为业的追溯,亦为发现大量玉器的石峁为黄帝部族居邑的说法提供了又一层证明。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

石峁遗址位于陕西省神木县高家堡镇,地处黄土高原北部的黄河西岸,毛乌素沙漠东南缘。经过2011—2015五个年度的区域系统考古调查和重点考古发掘,发现了由“皇城台”、内城和外城构成的石峁城址;揭露了外城东门址、韩家洼村贵族墓葬区、樊庄子“祭坛”等重要遗迹。上述工作为探讨石峁城址的兴废年代、聚落结构与布局、文化性质等问题提供了重要资料。

碳十四系列测年及大量器物标本显示,石峁城址兴盛时代不晚于公元前2300年,大致废弃于公元前1800年前后,面积达400万平方米以上,系国内已知规模最大的龙山时期至夏阶段城址。种种迹象表明,石峁城址的社会功能不同于一般原始聚落,已经跨入了早期城市滥觞阶段作为统治权力象征的邦国都邑的行列之中。石峁遗址的考古发现为正在进行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输入了新鲜血液,对于重新描绘公元前2300年华夏沃土上“万邦林立”的社会图景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皇城台”为高等级建筑的核心分布区,周边以夯山砌筑的护坡石墙包裹。台顶分布有组群的宫殿建筑基址,北侧有池苑遗址。2015年调查发现其北部尚有多达9级的护坡石墙,垂直高差约70米。通向皇城台的门道位于台体东北部,面向内外城墙。20世纪70年代仍可见台底通往台顶的石砌踏步,今尚辨其两侧对称分布的“墩台”等石构建筑。

皇城台的功能相当于后世城址中的“宫城”,布局有序、坚固雄厚、巍峨壮丽,大型宫室云集,建筑考究、装饰华丽,是整个城址的中心和贵族居住区,也是宫庙基址、祭祀等礼仪性建筑所在。皇城台的修建倾注了建设及使用者的巨大精力,在追求本体固若金汤的同时,保持其威慑感和震慑力似乎显得更为重要。

内城将“皇城台”包围其中,城墙依山势大致呈东北—西南向分布,面积约210万平方米;外城是利用内城东南部墙体向东南方向再行扩筑的一道弧形石墙形成的封闭空间,城内面积约190万平方米,内外城城墙总长度约10公里,宽度在2.5米以上。

石峁城内以天然沟壑为界区分的16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小单元(梁窑)上均分布着居址、墓葬等龙山时期至夏阶段的文化遗迹。这种“大聚居、小分散”的居住形态,暗示着遗址内部囊括了众多小规模血缘集团,当是统一的政体秩序得以建立以及由此所造成的结果。

五年以来,石峁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主要集中在外城东门址。东门址体量巨大,结构复杂,筑造技术先进,包含内城外两重瓮城、砌石夯土墩台、门塾、马面等城防设施,出土了玉铲、玉钺、玉瑁、牙璋、陶器和石雕头像等重要文物。

外城东门址是中国目前所见最早的结构清晰、设计精巧、保存完好、装饰华丽的城门遗迹,被誉为“华夏第一门”。即使在四千年后的今天,经过风雨剥蚀仍然让人感觉到气势恢宏、威严高大、庄严肃穆。

或者与上古历史人物的对照匹配。这也是考古学本身为人诟病的“见物不见人”的短板,但未尝不失为一种审慎的态度。基于这种立场,我们觉得还是应当立足于对石峁遗址本身进行客观介绍,避免对之做出考古学之外的任何解释。

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资料表明,石峁遗址所在的榆林地区共发现遗址13881处,其中仅新石器时代遗址数量就达4446处,占已知古代遗址总数的32%左右。在这4446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面积在1万平方米以下者2982处;1万~50万平方米之间者1452处;50万~100万平方米之间者11处;100万平方米以上者仅石峁遗址1处。虽然目前尚不能确认该区域仰光和龙山时期遗址的各自数量,但仅从这一初步统计所反映的趋势来看,遗址分布高度密集,暗示着该区域新石器时代晚期人口的急剧膨胀。

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的石峁遗址是公元前2300年该地区乃至整个中国北方唯一一处特大型中心聚落,与周围其他中小型聚落共同构成了四级聚落结构。从空间分布形态来看,处于第二等级的聚落(50万~100万平方米)多是次级中心,周边散布着数量不等的面积在1万~50万平方米之间的小型遗址。正是这种多层次的聚落结构系统,“聚邑成郡”,形成了以石峁为顶端的金字塔形社会结构,奠定了王权国家——石峁的政治、经济及人力资源基础。

考古资料显示,仰韶文化晚期至夏阶段(约公元前2800至公元前1800年)的北方地区经历了财富高度集中、高等级聚落涌现、大型宫室、祭坛及公共设施形成的过程。该过程中,聚落规模差异逐步加大,聚落等级化趋势明显;防御需求越来越强烈,壕沟、城垣等防御设施成为聚落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祭祀、占卜等现象日益常态化,成为凝聚聚落人群的核心手段之一;大型宫室、祭坛、王陵等反映社会公共权力的设施形成;个人财富不均、城乡分化初现,开启了早期城市化道路,迈开了走向早期国家的步伐。进入公元前2300年后,陕北西部、内蒙古中南部及晋西北地区中小型聚落数量暴增,中心聚落与小型聚落规模相差悬殊,每个(次)中心聚落的控制区域面积或在数百平方公里上下,使得区域内背景复杂的不同人群得以整合,最终形成了石峁遗址为代表的早期王权国家。

关于石峁遗址性质的认定从其横空出世之日起就引起了历史学界及社会公众的高度关注。先秦史学者沈长云先生率先发声,从古文献史学及历史地理角度纵横捭阖、旁征博引,提出石峁古城是黄帝部族居邑。此说一出,学界瞩目。作为主持石峁遗址考古发掘的考古工作者,面对史学界关于石峁遗址族属与性质的快速反应,促使笔者也不得不回过头来审视与之相关的问题。考古学注重实物资料的积累与分析,在没有获得充分内证性材料支持的情况下,一般不倾向于探讨考古学文化或某一遗址其背后的族群,

了文景之治的繁荣;同时,齐地的阴阳五行思想大行其道,“无论在宗教上、在政治上,在学术上,没有不用这一套的”(顾颉刚《汉代学术史略》,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阴阳五行思想自上而下渗透到汉人的治国、生产、养生乃至民族心理和民族意识中;接着,在斗争中不断壮大兼综百家后的新儒家代替黄老道家,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之后历代封建王朝沿用这一治国思想,齐鲁文化从地域文化汇入了华夏文化的主流。汉中央朝廷在对内推行思想文化大一统的同时,对外开疆拓土:首先是外交先遣,派张骞出使西域;接着直接进行军事较量,命卫青、霍去病等大将出征匈奴;然后纳人政治版图,宣帝时设立了西域都护府;最后是文化上的同化。儒、道思想经河西走廊随丝绸、茶叶、陶瓷等经济贸易传播到西域各地,因此成就了周、秦之后更大范围的東西文化汇合;魏晋南北朝时期儒、释、道三教的冲突与融合,华夏文化圈进一步扩大。

综合华夏民族圈的形成可知:西周的分邦建国形成了华夏民族圈的内层,春秋时期齐、鲁继承了周的征伐大权和礼乐文化,成了华夏民族圈的军事和文化中心。之后在政治版图上,周边其他民族逐层汇入此圈。在思想文化上,处于核心的齐鲁文化,凭借其儒、道文化软实力,同时借助帝王之权力平台,逐层推进文化影响,最终通过文化认同实现了真正的民族认同。
(作者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齐鲁文化与华夏民族圈

□ 刘爱敏

华夏,最初是对居住在中原地区汉族先人的称呼,以区别于四周的夷、狄、戎、蛮少数民族,汉代以后始称汉族。可信文献中,“华夏”一词最早出现在《尚书·武成》:“华夏蛮貊,罔不率俾。”孔安国解释为“冕服采装曰华,大国曰夏”。现在,华夏民族则泛指受中华文化影响的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华夏民族圈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两周秦汉时期是其中的重要阶段。在这一过程中,齐鲁文化这一地域文化起了主导和引领作用。

华夏民族圈的形成在西周至汉时期经历了四个阶段,形成了四个逐层外扩的文化圈。

第一阶段,西周封建建国至春秋前中期,文化圈局限在黄河中下游,腹地除殷商遗民宋国外,皆是姬姓宗亲子弟,有邾、卫、曹、鲁、燕等国,齐、晋两国分守礼乐圈的东、西两大门。西周封建,齐、鲁两国为首封,周王分封的很明确,因鲁国是周公的封国,立国之初便得到天子礼乐的厚赐和特权,“命鲁公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凡四代之服、器、官,鲁兼用之”(《礼记·明堂位》),而对齐,则是授予“五侯九伯,女实征

之”(《左传·僖公四年》)的征伐大权,目的就是要把鲁国建成东方文化中心,把齐国建成抵御东夷、藩屏周室的东方屏障。西周灭亡,周室东迁洛邑,王室衰微。这时齐桓公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帜,抵御了周边少数民族的进攻,团结了中原。孔子赞齐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孟子称“五霸,桓公为盛”。齐桓公称霸的意义,一是于诸侯内部,以频繁的会盟方式促进了中原内部各诸侯国文化的交融,用周的礼乐文化,统一了诸侯思想,凝聚了诸侯力量。二是于华夏文化圈外部,抵御了落后民族对先进文化的掠夺性破坏,捍卫了、延续了华夏族的文化生命。齐桓公代替周天子行使政治军事权利,其称霸是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始作俑者”,但也标志着春秋前中期齐国政治军事中心的确立。

第二阶段,春秋中后期,华夏民族圈从黄河中下游扩展到长江中下游,楚、吴、越被纳入进来。随着春秋中后期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相继在中原称霸,华夏文化也迅速同化于这些所谓“蛮夷”。楚庄王郢之迅速同化于这些所谓“蛮夷”。楚庄王受到了中原礼乐文化影响,主张偃武尚德;楚国灭陈后又复陈,说明楚国还遵守着春

秋战胜不灭国的礼俗;楚庄王大臣申叔时所列楚太子的课目几乎把儒家的六艺《诗》《书》《礼》《易》《乐》《春秋》全部囊括,显然是以中原文化培养接班人的接班人,表明中原文化在楚文化之中已占主导地位。夫差霸业的顶点是范蠡之会上,会上,吴王夫差去掉了“王”号,称“子”号;会后,又派大臣王孙苟告劳于周,表示要率诸侯“戮力同德”,共尊周室,因此得到孔子的赞扬:“大矣哉!夫差未能言冠而欲冠也。”(《穀梁传·哀公十三年》)是说夫差虽然并不能说出中原“冠”的等级含义,但“欲冠”本身则说明了夫差主动学习中原礼乐文化的态度,应该受到称赞。春秋中后期的霸主虽在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之间迭兴,但文化中心不在晋、楚、吴、越,也不在周。在齐国成为政治军事强国的同时,鲁国逐渐发展成为当时的文化中心,成了华夏文化圈“中心”的中心”(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78—279页)。

第三阶段,战国、秦时期,秦国参与到逐鹿中原的争战中,华夏民族圈进一步扩

大。战国后期无论是合纵还是连横,皆是东方六国与秦之间的斗争,这是政治上秦统一六国的过程,也是文化上秦加入华夏民族圈的过程。斗争的结果,秦政治上完成了统一,东方文化的西进却遇到了阻碍,最突出的表现便是焚书坑儒事件,坑的是齐鲁的方士与儒生,学术上表现为法与儒、阴阳五行家的冲突,深层透露的正是齐鲁文化与秦文化之间的冲突。这时齐文化与鲁文化经由齐国覆灭的百家争鸣已经融合为二元一体的齐鲁文化。《荀子·性恶》中首次出现了“齐鲁”并称:“天非私齐鲁之民而外秦人也,然而于父子之义,夫妇之别,不如秦之孝具敬文者,何也?”秦统一后的华夏民族圈,齐鲁文化的领导能力受挫,但没有齐鲁文化中儒、道思想的中和,秦法家治理下的王朝也迅速走向瓦解。

第四阶段,西汉时期,河西走廊与天山南北纳入华夏民族圈版图。秦法家治国失败以后,齐鲁文化迅速占领官方思想和主流意识,先是“培植于齐、发育于齐、昌盛于齐”的黄老道家从汉西走向汉中央朝廷,黄老道家的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思想适应了汉初战后的社会状况,成就

由首都师范大学电子文献研究所、中国诗歌研究中心等单位主办的“第五届中国古籍数字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近日在北京召开。来自海内外的70余名专家学者,以“古籍数字化实验室建设”为主题,分别就古籍文献数字化保护手段、数字文献学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简繁体转换与古籍数据库字形处理、数据库与网络出版、基于自动排版、古籍个性化出版等前沿课题进行了研讨。

国家图书馆原馆长詹福瑞指出,古籍数字化加快了古籍保护进程,并有效地解决了古籍利用和保护之间的矛盾。但是,目前的古籍数字化尚未形成严格规范的国家标准,古籍整理还存在许多问题,急需人工智能等技术创新。首都师范大学电子文献研究所所长尹小林对古籍数字化的发展提出了三个方向:一是内容的精细化,二是手段的现代化,三是传播的国家化。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姜锡东指出,古籍数据库对于研究者来说,最重要的是检索功能。现在,古籍数字化突飞猛进,需求更具个性化、多样化。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柴剑虹就海外所藏中国敦煌文献数字化问题提出,“合作创新模式”是古籍数字化发展的方向。浙江师范大学黄灵庚认为,国学网在古籍数字化方面走在前列,对于学术研究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仍有一些值得改进的地方:第一,《全唐书》不录异文。而异文对于学者研究是最重要的。第二,可以继续做专业化的数据库。如出土简帛数据库等。第三,应更加扩大数据库的规模。家谱、地方志应列入数据库。上海大学杨逢彬介绍了自己利用古籍数字化产品进行学术研究的心得。他说,“审句例”是解决古籍疑难问题诸多途径中的最佳途径。复旦大学吴格介绍说复旦大学图书馆在古籍数字化方面的成绩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古籍影印的制作,包括善本9724叶,普通古籍9399叶。第二,古籍全文数据库的建设,收录古籍3047种,善本1956种,稿本、抄本590种。

美国辛辛那提大学图书馆馆长王雪茅指出现代学者的治学既要研究传统的入文学知识,也要利用现代技术,只有二者结合,才能进行有效的学术研究。埃及学者穆罕默德·谢赫对埃及及国家图书馆等收藏机构在古籍数字化方面的主要成绩、韩国大真大学李燕对韩国古籍收藏数量靠前的各个机关的电子化发展简史做了梳理与介绍。

与会者还听取了首都师范大学电子文献研究所与北京艺术博物馆联合于2014年创建的数字文献实验室的建设情况。这所全国首家以“数字文献学”为依托建成的科研实验室,目前可以完整实现从线装古籍到当代纸质出版物及不同载体电子出版物的全套流程。未来将通过数字化技术与古籍善本进行加工、存储和利用。即要具备强大的处理古籍文本、碑帖、拓片、字画、舆图等文献资料的能力,要将原始文本转换成数字资源,要建立超大规模数据库,以存储海量的数据信息并在这些信息之间建立超链接联系;要有对上述数据进行分类、管理、挖掘、汇总的能力,以随时根据需要将数据输出为数字化产品。
(李莉)